

1302



集美文史資料

何清光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第9辑

集美文史资料

第九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目 录

陈嘉庚先生在最后的日子	张其华 (1)
参政议政的楷模陈嘉庚	白少山 江菱菱(28)
赤诚爱国 鞠躬尽瘁	陈少斌(36)
集美区政协成立的经过	吴丽冰(41)
民盟集美基层组织发展史实片断	白少山 王东良(48)
后溪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王忠敏(56)
扎根集美 走向世界 ——厦门飞鹏企业发展概况	王小林(68)
兑山后裔李友邦将军	王进法(74)
陈敬贤先生晚年的一段佛缘	陈延杭(80)
鲁迅先生在集美学校的一次演讲	王小林(86)
我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经过	陈少斌(89)
集美龙舟赛	林忠阳(95)
集美“命世亭”	陈少斌(99)

风行水上涣

——《陈嘉庚》创作札记 傅子玖(101)

集美区灌口凤山祖庙宗教民俗访问团访台纪实

..... 陈清平(113)

集美区移台先民及他们的后裔 陈清平(120)

清嘉庆年间“集美十八槳船”轶事 陈延杭(124)

集美传统的婚娶习俗 于 迅(127)

明代名宦张暉墓 颜立水(136)

康尔韞墓与“宪奉”石刻 颜立水(140)

陈嘉庚先生 在最后的日子里

○张其华

1950年5月21日陈嘉庚先生离开侨居长达60年之久的新加坡到达北京，9月5日回到他的故乡集美定居。我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在他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直到1961年8月12日他逝世为止，前后十年有余。嘉庚先生逝世迄今已38年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在晚年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的精神，他心怀祖国统一大业、关注家乡建设事业的情怀，至今仍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

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

1956年5月下旬开始，陈嘉庚先生感到右眼眉上端有异样，类似一只蚂蚁在爬动，微微作痛。7月在北京，异样感有所增加，自认为可能是头风，抄了随身带用的《验方新编》一服医治头痛头风的药方，叫警卫员去同仁堂药铺抓药。方中有一味“川乌头”写明“半生熟”，配药员把“半生熟”川乌头配成生熟各一半，导致服后中毒，经保健医生

解毒后恢复正常。此时，好多人劝他留京查明头痛的病因，但他总是挂心集美学校而匆匆赶回。此后头痛断断续续，他不予理睬，继续服点便药而已。

1958年1月19日，嘉庚先生北上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火车的第二天，发现右眉上端有个肿块，正是一年多来疼痛的部位。抵京后肿块更加突出，即进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是鳞状上皮癌。在中央和周总理直接关照下，组织专家会诊，并进行放射治疗，没有多久，肿块消失，癌细胞暂时被控制。嘉庚先生有着战胜一切的坚强信念，他根本不当作一回事，多位亲友和领导建议他住在北京进行观察和医治，都被他婉谢了。他还准备在头痛减轻后再安排较长的时间外出考察。回集美后，1958年5月20日，右眼眉上端肿瘤再次隆起，伴着头痛，视觉模糊，看物有双影，于6月4日入厦门第一医院，总理派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吴恒兴和上海眼科专家郭秉宽两位教授来厦诊治。6月12日转入上海华东医院，由吴恒兴、郭秉宽两教授为主，组织上海有关专家会诊治疗。中侨委副主任庄明理、厦门市副市长张楚琨和秘书、警卫员跟随先生身边。他在海外的亲属经商议决定委派第八公子陈国怀回国长期侍候。周总理六月下旬亲自到病房看望和关照。下旬以后，嘉庚先生病情转危，疼痛加剧，胃痉挛鼓胀，进食困难，不能起床，体力难以支持。

他痛苦万分，却从不哼一声，仍然积极地配合医生，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但他已自感病情严重，需作准备，从6月28日上午开始，约其八子陈国怀、叶祖彬和我三人在他床边，口述遗嘱，由我记录，再念给他修改。因放疗引起病痛，有时整天无法进行，断断续续，前后经三四天才完成。此时，抢救方案出现分歧。脑、五官、肠胃等专家认为继续放射治疗，会导致身体全垮，更为危险，主张暂停或放弃放射治疗，先解决胃痉挛，输入营养，恢复体力。唯独肿瘤专家吴恒兴坚持已见，认为只有乘胜追击，不让癌细胞有喘息复苏机会，才能达到有效的控制。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华东医院领导决定由肿瘤专家最后拍板继续放射治疗，其他各科医生配合，度过极其紧张、艰难的一个星期，成功地抢救过来。这时吴恒兴院长满有把握地说，他可以保证嘉庚先生再活三年至1961年。这个保证确实不折不扣地兑现了。嘉庚先生体力逐渐恢复，虽然疗程尚未结束，但他牵挂着学校和海潮发电站，于11月初回集美，亲自指挥和安排有关事项，整整工作一个月之后，再到北京继续治疗。

这个时候，嘉庚先生已经意识到，肿瘤经过治疗，虽然可以控制，但是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生命留给他继续工作的时间有限了。从此，他更加珍惜自己有生之年，抓紧时间和机会，力争做更多的

事。

1959年4月，他继续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继续参政议政，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利用他大会发言，提案或通信反映，将自己所接触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对地方建设和教育的考察实践发现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和建议，或表明自己的看法，一如既往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力尽责做国家的主人、共产党的“诤友”。

5月初，嘉庚先生在北京治疗中又赶回集美。他以86岁高龄、右眼已失明、每天要服药止痛的病弱之躯，亲自主持了5月14日华侨博物院剪彩开幕典礼。会上，他讲了博物院的创办和筹建过程、意义、总的设想、陈列的概况。会后他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带领来宾参观并介绍陈列内容。他认为：“华侨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的一种，与图书馆、学校同等重要，而施教的范围更为广阔。学校为学生而设，图书馆为知识分子而设。博物馆的对象不限于学生或知识分子，一般市民，无论男女老幼，文野雅俗，一入其门，都可以由直观获得必需的常识。”他还认为，用“华侨博物院”名义，不冠以厦门地名，可以包含世界各地文物。他于1956年开始筹办华侨博物院，自捐10万元，另向国内外侨界筹募27万元，并亲自选址，制定规划，监督施工。亲自在

国内搜集、选购文物和陈列品，亲自发函向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和知名人士、社团征集展品。按照他的规划，华侨博物院由五座大楼组成，内设四个博物馆。举行开幕典礼时只建一座大楼，设华侨历史、祖国历史和生物标本三个陈列室。与此同时，他呼吁在全国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建立北京华侨历史博物馆，并表示带头捐款。

关心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 坚决谴责印度尼赫鲁扩张主义行径

嘉庚先生历来关心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1959年6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取得胜利，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实行自治。7月9日，嘉庚先生亲拟长篇电文致李光耀总理，祝贺“贵党成功”和祝福“新加坡国万岁”。

嘉庚先生极为关注尼赫鲁扩张主义挑起的中印边界争端事件。1959年印度尼赫鲁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西藏分裂分子叛乱，指使印度军队不断越过边界侵占我国领土，嘉庚先生十分气愤，坚决予以揭露，并且加以谴责。

他与尼赫鲁的私人交情颇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尼赫鲁为推翻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1946年3月，尼赫鲁访问新加坡，他亲自到机场迎接，

并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在怡和轩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当时的新加坡与印度同样都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他致欢迎词时却毫不回讳地称赞尼赫鲁所致力的斗争是“为印度民族求解放，为数万万人谋幸福。”并预言：“印度几亿人民脱离苦海，有赖于尼赫鲁先生的领导。尼赫鲁深受嘉庚先生友好和热情的支持所感动，称赞嘉庚先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友。1954年尼赫鲁访问我国，嘉庚先生亲自往机场迎接和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宴和宋庆龄的家宴，并于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欢迎尼赫鲁先生》。可是当尼赫鲁推行扩张主义，企图染指我国领土的阴谋暴露无遗时，嘉庚先生无法容忍。只要是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大事，他便毫不含糊，毫不顾及私交和情面，坚决予以抨击和揭露。1959年4月24日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愤怒谴责尼赫鲁的侵略行径，义正词严地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过去和现在都不容许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又说：“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做出印度人民所不愿意的事情，同样的，印度人民也不应该放任怀有野心的政治家作出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的事，如果某些野心家敢于向中国人民进行挑衅，将是飞蛾扑火。”同年9月13日，他就中印边界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有力驳

斥尼赫鲁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制造所谓“麦克马洪线”所作的辩护。他责问：“尼赫鲁先生！麦克马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曾经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如今你竟把以麦克马洪命名的界线硬说是合理的，难道你对此不感到难过吗？记得我在新加坡时，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克唐纳曾对我说，尼赫鲁先生是真正忠诚于英国的。难道尼赫鲁先生当真使帝国主义拍手称快吗？”又说：“我代表广大爱国华侨，完全拥护政府处理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私交归私交，事关国家民族利益大事则不让分毫。嘉庚先生当年对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放任右派势力掀起反华排华恶浪也持同样的态度。他曾经支持和赞扬苏加诺总统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解放所进行的斗争。他认为：荷兰殖民统治者，既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也是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共同的敌人。他公开抨击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的残酷统治，是“鱼肉印尼，欺侮华侨”。他号召印度尼西亚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起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荷兰当局派人对他进行威胁和恫吓，他不畏缩，当面表示要针锋相对，要发动新加坡和东南亚华侨对荷兰殖民者予以经济制裁。他也没有忘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战败投降后他从泗水启程经巴城要回新加坡时，苏加诺派武装卫士秘密护送的

深情厚谊。但当印尼反动势力掀起反华排华时，他同样旗帜鲜明，坚决站出来为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而斗争。1959年12月16日他在全侨联一届四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说：“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斗争中，已经结成了患难之交。但是令人痛心的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别有用心势力，却以怨报德，公然把华侨当作敌对国家的侨民对待，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完全是一种忘恩负义，以友为敌，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海外侨胞最有力的靠山。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印度尼西亚遭到非人道的待遇的侨胞，感到特别的关切。”

他拥护我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和措施，强调要做好归国华侨和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和安置工作，并为此，在全国侨联会上提出安置侨生的具体意见，认为这事与安置归侨的生产、生活同等重要。他部署了集美中学、集美侨校扩招侨生的具体措施，调整和腾出校舍，赶制校具，这些工作为安置1960年3月份从印尼撤离回国的华侨学生二千二百多人做了准备，使这些侨生很快地安定下来，在环境优美的集美学村就读。嘉庚先生这一立场和措施，有力地支持了华侨反排华斗争的行动，赢得了广大华侨的赞扬和拥护。

在“8·23”特大台风中

1959年8月23日，整个厦门和集美遭到特大台风正面袭击，台风从凌晨2时刮到5时，暴雨、洪水、海潮三管齐下，海水浸泡着整个集美镇。嘉庚先生彻夜未眠，在宿舍里来回踱步，焦急地观察着这突如其来的特大风暴，将造成怎么样的破坏和影响。

风稍静，水一退，他就带领我们和建筑部工程人员出发检查。一路上被刮倒的树木、电杆七歪八倒，瓦砾、电线、玻璃遍地皆是，校舍中倒塌的有即温楼、西膳厅、第一膳厅、体育馆、延平礼堂、科学馆平屋、渔具厂等处，未倒塌的屋顶瓦片大半也被刮走，或片瓦不留；道路、园林、游泳池、龙舟池及辅助设施损失也很大；集美镇居民住宅倒塌27座，死亡58人（其中外地船员死47人）。

面对这场灾难，嘉庚先生伤透了心，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沉着、坚定，他边检查、边指挥、边组织抢修队伍。倒下的树木、瓦砾要建筑部组织突击队清理；损坏的电杆和电线由电厂抢修、更换、迅速恢复通话和照明；冲坏的学村道路由建筑部抢修；村镇道路由镇人民政府配合，同步进行；受到损坏的教学楼，以师生宿舍、膳厅为重点，首先抢修；损坏较轻的由各校各单位自行解决，建筑部协

助，并与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将正在修建的道南楼工程放缓以保证重点。还与各校校长商量，决定推迟上课。

嘉庚先生部署灾后抢修措施后回到自己房间里，仍不休息。他一笔笔细算，校舍及设备损失约达 82 万元，生产队和居民住宅损失约 24 万元。这笔巨大的资金，如何筹集，他在发愁、焦急之际，突然接到周总理发来电报表示慰问，并通知福建省人民政府拨款支持。紧接着，江一真省长也发来电报慰问，并由财政厅拨出台风救济款 80 万元。周总理日理万机，对嘉庚先生操心的具体事却是那样的重视与关心，江一真省长又及时将款拨到，这使嘉庚先生非常感动。在政府关怀下，学村师生和全镇上下听从嘉庚先生指挥，齐心协力，只用了半个多月时间，便恢复了正常秩序，学生复了课，教学并未受太大影响。少数需要重建的教学楼，也在 1960 年内最后完成。

嘉庚先生为抢修校舍付出全部精力，直到完全就绪以后，他旧病复发，无法工作下去，不得不再次于 9 月 13 日到北京治疗三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他不仅拨款、拨材料帮助集美镇居民，恢复生产、抚恤死难家属和灾民，并且提前实现了原先一项计划，即在几年内帮助贫苦居民改建、重建历年倒塌、破坏的民房 200 多幢。

关注“海潮发电站”的尝试

1959年，嘉庚先生还为海潮发电站呕心沥血。兴建海潮发电站是由一位叫邱后丛的工程师建议的。邱提出利用海潮的落差发电，建议从杏林湾水库东侧集美段开一条通海渠道，发电机组安装在水渠出海处，退潮时利用水库高水位与海潮低水位之间的落差，引水出海，通过水轮机而发动。涨潮则利用高于水库的水位，将海水引向水轮机而发动，平潮则通过航海学校后操场的高坡地自建一个容数千立方米蓄水池的水倒灌，启动另一台水轮机来发电。蓄水池的水，也是通过水泵把潮水打上去的。主要工程是一千多米的通海渠道和蓄水池，以及发电机、水轮机、水泵的设备和安装，投资24万元，可发电200千瓦到250千瓦。

嘉庚先生一向重视技术开发，加上多年来学校发展迅速，电厂供电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扩充。他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根据邱后丛工程师建议进行试验。他说：如试验成功，是一个突破，既解决学校用电的困难，又可在沿海省份推广，意义重大；如果失败，就是24万元的损失，可将基建项目拖缓，以利息来弥补。他给二子陈厥祥的信也说：“我想未必完全失败，或者减少电力为150千瓦，或100多少耳，然正当之失败胜于畏惧之失败，无悔恨也。”

该工程 1957 年年底开工，原定 1958 年“八一”发电，年底完工。但由于邱后丛原设计要求与实际操作差距太大，最高潮的主轴转速才达到设计水平的一半，在低潮时甚至不能发动，水泵也无法把潮水抽入蓄水池，预定的时间和投资已大大超过，陷入步步加码，欲罢不能的地步。

嘉庚先生 1958 年在上海治病时，看到不能如期发电的报告就很挂心，治疗还未结束，身体有所恢复，11 月初就赶回集美。他每天到工地现场检查，亲自帮助解决邱后丛提出的各种问题。直到身体支持不了，于 12 月初再到北京继续治疗。在北京几个月内，一边治疗，一边为海潮发电站日夜操心，每星期都来电来函查问和作指示，有时两天来一次信。他还亲自为发电站解决五千包水泥，写信给石匠为发电站调整石料规格，并临时放缓其他工程，将泥水工调到海潮发电站赶修。当周总理在 1959 年 4 月初通知福建省政府汇 20 万元支持海潮发电修建时，身在北京的嘉庚先生感到压力很大，即于 4 月 6 日来电，4 月 8 日来函说道：“周总理令省汇 20 万元助修水电，我不敢即收，（认为）能修建成功，然后接受，如不能成功，我有何颜接受，万望共事诸位善体我意，必期成功……”“免为总理失望”。当他得知款项汇交集美学校委员会已是既成事实后，又于 4 月 11 日来函，提出加紧修建的六条措施，要秘书

抄送给邱后丛及各共事人员研究。他还不放心，4月13日又来函说：“我自6日接电话报告周总理助款20万元修水电厂事，即许多次电函告，不惜工料费、修建费，嘱你们会诸技工头头，切速研究电我知也。”

此时他已停止放射治疗，采用针灸、服药、外敷多种方法配合，疼痛有所减轻，而为海潮发电站和华侨博物院即将开幕，他来函通知，“我决定‘5·1’后回校。”

嘉庚先生回到集美后，不顾病体虚弱，天天到发电站工地现场检查。他经查验发现邱后丛处事不实在，没有正视落差冲力不足等设计达不到的主要问题，只就次要问题修修补补，或借口自来水公司的水渠渗水，或归咎于强台风的破坏，甚至弄虚作假，拉专线以电灯厂的电冒充是海潮发电站发出的电。嘉庚先生日夜操劳，多方设法挽救这项工程，直到病情加重，再北上治疗。

1960年海潮发电站在历经三年，耗资91万元之后终因成功无望而放弃。这个工程不仅使嘉庚先生消耗了精力，而且使他造成精神的创伤。这在嘉庚先生晚年的建设事业中是一次大的挫折，对87岁高龄又重病在身的嘉庚先生是一次打击。

虽然工程失败了，但嘉庚先生那种重视技术开发、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永远值得大家敬仰。